

留学纪事



福建留学生同学会福建师范大学分会编

一九九四年一月

写在前面

福建留学生同学会福建师大分会现拥有会员 80 多名。如果从 1916 年的留美学人算起，师大的留学生史几乎和师大的校史一样悠久。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出国学习、研究的人员，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为了祖国的富强，他们远涉重洋，求学异邦，立志建功立业。他们辛勤的汗水已浇灌出芬芳桃李，远大的抱负正在变成现实，他们中不少人已成为有名望的教授、专家、学者，为福建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和母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校的对外交往有了很大发展。15 年来，我校派往各国的留学人员有 150 多人，进行短期学术交流的则达数百人次。已学成回国的 70 多人中，现已有 55 人成为正、副教授、26 人成为校、系、所领导。他们已成为我校教学、科研、管理的一支生力军。

八十多年来，我校各时期留学人员，从不同侧面亲历目睹了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科技的飞跃发展和祖国独立强盛的艰难历程。为了记下这段难忘的岁月，互相交流各自的留学感想和见闻，也为了让更多未出国的人增进对当今世界和有关国家的了解，进一步促进我校今后的对外交往工作，师大留学生同学分会于 1992 年 3 月发动会员撰写留学期间的收获、感想与见闻，几经周折，终于编辑出版了这本《留学纪事》。入选文章的作者虽然只占我校历届留学人员中的一部分，但他们中既有年逾九旬、白发苍苍的早期留学欧美或东渡日本的老一代学人，也有正当盛年，八、九十年代留学各国的新一代归国学子。他们或以朴实无华的文字，或以生动有趣的笔墨，写下了各自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这些文章，有的是立志报国、崇尚科学、执着追求的感人篇章；有的是中外友谊、文化交融、友人往来的动人记实；有的是西方社会或

其科技文明，或其制度弊端的真实写照；有的是各国各民族或其民族精神，或其风土人情的细致描叙。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福建师大要实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目标同样需要有更多的人走向国门，学习各国在教育、科学、文化、管理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有鉴于此，这本小册子的编纂出版就更具有现实意义，相信读者可以从中获得激励，获得知识。

在编集、刊印过程中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与鼓励，特别是教务处欣然应允负担刊印费用，使这本小册子得以顺利与读者见面，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福建留学生同学会福建师大分会

1994年1月



目 录

(按首次出国留学年月先后排列)

在日本留学六年的感受与启迪	吴自强 (1)
自费留美生活片段	林玉玗 (7)
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给我一件终生难忘的启发	刘蕙孙 (11)
回国卅五年的反思	林恩卿 (16)
离开美国的前前后后	陶德悦 (19)
难忘的六十五分钟——回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赖耀光 (21)
不是为了忘却的记忆	陈维振 (24)
留学罗马尼亚	庄兴无 (25)
80年代初留日印象记	张景榴 (29)
语言学校中的琐事	杨亚天 (39)
我热爱的是数学事业	薛卫民 (41)
留英三年记事	杨长贵 (45)
博茨瓦纳纪感	许月容 (51)
意大利纪行之一	林金水 (55)
冲绳音乐考察散记	王耀华 (64)
美国人的三句谎言	林本椿 (75)
亚舒兰的莎士比亚戏剧节	张祥和 (77)
留美“吃亏”记	林大津 (79)
留英纪事	徐慎初 (81)
旅英琐记	陈 凯 (85)
岩石上的青苔	陈 震 (87)
汉字与漠字	范闾仙 (90)
难忘的赴美岁月——S·B加州大学纪事	谢树森 (92)

凯斯比尔先生.....	孙绍振 (97)
英国见闻	李洪才 (100)
海峡两岸学子心连心	林正云 (102)
附录：福建留学生同学会师大分会会员一览表.....	(104)

在日本留学六年感受与启迪

吴自强

留学日本的由来和历程

我是1901年出生的。幼小时家贫如洗，只能半耕半读，由农村私塾转入秋溪小学，17岁小学毕业。当年7月考入公费的临川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5年，于1922年毕业，校长张一清聘我在农村师范科工作近5年。1925年冬，校长到南昌省教育厅开会回校，他知道我想升学，告诉我说：“江西教育厅快要恢复留日官费，若你想升学，可先自费去日本补习日语和应试科目一年，到明年春季报考，中日双方制订的特约五校，考取后由省教育厅按月发给公费”。我得悉后，当即回家向知交学友筹借150元，连同未领取工资及张校长赠送的50元，合计300元，就于1926年元月离别师友、同学等，同另一位同学余澈君结伴同往南昌省教育厅办理出国留学证件，后经九江、上海等地离开祖国，乘船东渡日本，约10天左右到达目的地——东京。至今已有60年了。

苦读一年如愿以偿

在补习的一年中，每天吃两餐，早晨买面包或番薯充饥，晚餐才吃一顿干饭。开头几个月专学日语，自修数学，每天上午八时乘电车到神保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上日语课二小时。教文法的是校长松本龟次郎，教会话的是椎木先生，教读本的是吉泽先生，他们都是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的启蒙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能说点简短的中国话，使我们听日语更易懂。历时四个月，开始

能听懂一些日语教学的语言，随即到东京“研数学馆”报名参加夜间学习数学（代数、几何、三角）、英语则报名函授学校，即在家做作业，寄给老师批改后发还。这一年中，每天黎明即起，夜晚到12点才就寝。学习很紧张，但营养不足，以致身体日渐消瘦，不过精神尚好，未发生什么疾病。唯因经济无接济，心里常怀不安，怕考不取官立学校，势必要葬身异国。

1927年2月，日本特约五校开始考中国留学生，我首先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受试后，各科笔试成绩均尚可，只是由于口试及体格检查时，主试人说我年龄偏大，身体消瘦，发榜时果然落选。后来我改变了学习、生活方式，以休息为主，减少学习时间，准备报考其他学校。3月，先后投考明治工专及东京高师，考试后发榜，两校均获录取，我由于出国前是学师范，又在母校工作近五年，加上张校长也是东京高师毕业，临别时他希望我受教育，因而决定到东京高师就学，以偿夙愿。

在东京高师五年的学习生活

（一）一年特别预科

为了让中国留学生学习专业课作准备，校方将考取留学生编为一个班，专门学习基础课程，计有日语、英语、地理、历史、体育等科目，授课教师主要是附中老师及讲师，一律用日语讲授。这一年的学习，是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一步。一年结束后，按志愿由教务课编入本科一年级，和日本学生同班上课。我选入文科第一部（即教育系），该班共有日本学生30余名，中国留学生3名，一直到毕业都是同班上课。

（二）本科四年的深刻印象

（1）经受两位校长的领导。初入校时是历史学专家三宅米吉文学博士任校长，不到一年半左右，他因病逝世，改由教我们教

育学科的文学博士大濑甚太郎继任，他的教育思想是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唯心主义教育思想，在他所著《新教育学讲义》中阐述得很详细，是当时日本一位有名的教育学专家。

(2) 教师阵容。教授中多数是守旧的，只有极少数思想比较进步。有的教学挺认真，也有个别马虎不负责任，甚至有的使我们很反感。如教我们政治经济学两位教师，一位是年轻讲师盛田先生，他上课时总是穿着一身破旧的西装，蓬头散发，走进教室就在黑板上书写剩余价值公式，阐述工人们受剥削的理论，同学们都肃静地听着；另一位老教授中岛先生，个儿较矮而肥胖，他教课时手里老是捧着一本英语原著英国李嘉图的经济学，在教室里谈天说地的混时间，考试也较松弛，大家听起来都有厌恶情绪。另外，还有两位教授对我印象很深：一是教《日本宪法》的苅教授，他一进教室，即面向黑板，拱手祷告，祝天皇万寿无疆，然后才面向学生一条条的讲解；还有一位教《东洋伦理史》的获原先生，采用《孟子》作教材，按照日本语的读法进行解释，他是尊崇孔孟学说的专家。1929年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军节节胜利，当时国内知识青年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封建主义”等等口号，日本报纸纷纷刊登这条消息。下课后，获原先生特地对我说：“你们国内年轻人怎么这样乱闹，孔子是世界有名圣人之一，为什么要打倒他……”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只有唯唯诺诺地回答他几句。另外，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即当时东高师负责管理在校中国留学生的马上教授，在1928年5月一次召集中国留学生聚餐会上竟公开说：我对诸君的成绩处理，你们政府有来查询时，凡属于丙等者则告以乙等，属于乙等者则告以甲等。以这个号称日本师范教育中心的东京高师留学生管理人员，尚且这样欺骗我国政府，其他可想而知矣。当时我对此思想上颇有反感。当然，也有教学认真负责的。如教育史的乙竹岩造教授及教心理学的田中宽一教授，他们都学识渊博，广泛地宣扬西方的所谓新

教育思潮，很受同学们欢迎。

(3) 学风问题。日本学生生活是极其简朴的。他们都能树立勤俭为荣、奢侈可耻的风尚。比如初进校时的新生，购置了一套学生制服，大家都把上衣的铜扣子（有“高师”二个字）擦黑，以表示简朴和资格老。学校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师范生一律住学生宿舍，灌输其忠君爱国思想，上课时各科无教本，教师口念讲稿，学生记笔记，下课后进图书馆看参考书。我们班里有一位叫恒本君的日本同学，我经常看到他拿着一本英语辞书在背诵。中国留学生都住在校外，除上几节专业课外，其余时间由自己支配，较用功的在家自学，修改听课笔记，看参考书，但也有不少逛街游玩，混日子的，五年后能得到一纸毕业证书便心满意足了。

最后，回忆一下当年台湾、朝鲜同学在校的学习情况。当时台、朝都为日本所侵占，日本在这两个地方都设了总督，都办有大、中、小学，绝大多数青少年都是在当地受日本的奴化教育，但也有少数人家住东京，因而就地入学。我们班上有一位金同学，他经常向我讲了日本人对他们的虐待和歧视，点名簿上和日本学生编在一起，受尽日本人的歧视，思想负担很重，他希望中国强盛起来，帮助他们国家翻身。我回国前夕，他特地来送行，并赠我一帧纪念照片，我已保存了 60 年整。

几点感受和启示

(一) 改革留学制度。一个主权国家培养高级人才，应立脚本国。派遣留学生应按国家需要，自主选派，不能把教育权操诸外国人手中。由于我看到国民党执政时代留学教育的弊病，1930 年我写了一篇《日本对我国留学设施及今后我政府应有的觉悟》的论文，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办的《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同时我还上书江西省教育厅，提出《修改派遣留学生规程》，完善留学制度，改

革管理方法。这些意见虽是 60 年前的事，但我认为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

（二）为亡妻扫盲。日本国民基础教育在当年已有普及，旅馆里的“下女”（即女服务员）都受完了高等寻常小学教育。反观旧中国则不然，到处文盲充斥，80%以上未受中国基础教育，女子上学更是凤毛麟角。亡妻复礼 18 岁与我结婚，由于家贫无法上学，目不识丁。当时我在日本学习，虽有官费，但不能按月收到，因而我就写信回家，要我的一位小学生章有成（已逝世）教她识字，自己利用暑假翻译一本《满蒙经济大观》，寄到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卖版权得现洋 300 元。我于 1929 年 9 月归国探亲，带她去东京居住二年半，我用陶行知为他母亲扫盲的教学方法，每天早晚教她读《陶行知家书》，并教她每天写大、小字，做算术，经过二年多时间，她已达到小学程度，1932 年 1 月我修完学业，便在“一二八”上海事变的当天，携妻子连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男孩，匆忙归国。回忆过去，看看现在感触很深。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女同志才真正得到了翻身，但普及义务教育，男的可能达到 90%以上，而女的与男的对比，仍有差距，特别是农村差距更大。因此，我认为重视女子教育的普及，实为当务之急。

（三）勤劳苦读为成功之母。我从小到老都遵循和奉行这条原则。记得我在三师的五年学习期间，每逢寒暑假回家，我总是整理一间陋室，名曰“惜阴斋”，白天跟着父亲去田间干活，早晚就在室内自学。到日本留学后，看到不少日本同学那样用功读书，更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所以归国后，我在南昌一中教书垂 20 年之久，采取了不少类似日本教育的方法，在校施行，取得了一些好效果。这不能不说是我受日本教育的影响和启迪而得来的。

（四）重视体育教育。日本青年学生都很重视体育锻炼。我在东京六年，经常看到日本青年在街上沿着电车路轨赛跑，心里实在激动。就于 1932 年归国前夕，下定决心，抱着“国弱体先强”

的心情，从我做起，开始长跑活动，至今 60 多年从未间断。由于我天天坚持长跑锻炼，因而经受住了许多风风雨雨的考验，于今活到 92 岁，在这一点不能不感谢日本教育对我的启迪。

(五) 最后，让我谈一下六年中的二三件琐事，课余之暇或星期日，我经常去书店寻找新出版书刊，有些进步书刊，其中有关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语句，常以×××代替，甚至整页开天窗成白纸。1930 年 5 月，有一天报上刊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由京都帝国大学来东京帝国饭店讲演，我用五角日元买一张入场券进去听课，饭店里面坐无虚席，有的站着听。但见讲台两侧，坐着几位高级警官，当河上教授讲到触犯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语句时，警官立即提出警告。我看到河上教授有苦难言的情景，既同情又害怕。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号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真实写照。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在回国前一年译出一本有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小册子，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周予同先生（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已逝世），请他推荐出版。他回信说：“国内文纲密布，此书无法介绍，原稿奉还”。回忆以上诸事，心里常感不安。但又想到日本一些进步学者，在那种困难环境中，仍然正气凛然地宣传真理，实属难能可贵。正如毛主席所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不论还要经过多少曲折和困难，日本人民终要赢得自己的胜利。”这个预言论断是正确的。今年正值中日建交 20 周年纪念，特写这篇回忆录。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愿中日两国人民子子孙孙永远友好下去，为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持续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附注：日本二次大战失败后，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的学制改为模仿美国，师范教育丧失独立，东京高师并入筑波大学去了。

自费留美生活片段

林玉玑

我赴美留学共两次，第1次是1921年至1931年，第2次是1948年至1950年。其中第1次又分作三个阶段：1921—1923年是边学习边打工，1923—1926年为单一打工，1926—1929年为单一求学，接着工作了两年。现就回忆所及，叙述如下。

受阻天使岛

我是1921年3月和另外3位同学、同事一起在教会的帮助下，从上海黄浦江乘美国某公司的大轮船去美国留学的。所谓“大轮船”其实很小。为了省钱，我们都坐统舱。据我的回忆，当时我国9角8分可换到1块美金。我带了300块美金出洋。

这只船很小，不敢横渡太平洋，只能沿着海岸线走，足足航行4个星期，才到达旧金山（大船航程只需12天）。船快到旧金山时，我们这些坐统舱的乘客都被赶下船，关在离旧金山尚有20多海里的天使岛上，理由是检查身体，重点是检查砂眼。教会的人到旧金山接我们一行4人，落了空。一问，才知道我们被关在天使岛。经过交涉，我们在天使岛滞留了两夜，才抵达旧金山。

在旧金山休息两天。乘汽车游览市容。那时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感到新鲜，连抽水马桶也感到新奇。两天后我们4位开始奔赴各自的报到学校。我和一位姓郑的同学一同到美国北部一个叫南德库他州的卫理大学就读。那地方天气很冷，冬天气温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每年11月开始下雪，积雪达1米许。至次年6月雪才融化完。

我和郑同学是4月底报到的，6月中旬该校即放暑假。在这期

间，校方派一名英语教授为我俩补习英语。我们本来在国内教会学校读书，已有较扎实的英语功底，补习一个多月后，即被认为合格。秋季开学后就开始正式上课。我攻读的是物理，读了一年，至翌年6月中旬又放暑假。进该校时，有言在先，是勤工俭学的，学校安排我和郑同学帮助食堂剥马铃薯皮，以换取三餐伙食费，即使这样，我这时带来的300块美金也快要花完了。怎么办？只好利用暑假去打工。

打工险遭殃

学校所在地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大工厂。而且，在雇主看来，我的个子既小，身体又弱，更不愿意雇用。我只好到农村去找活干。

那是个加拿大农民的个体农庄，占地1平方英里。主人一家3口：夫妇俩和一个儿子，另外雇了一名长工。农庄主要出产马、牛和猪。我干的活是为耕马套马鞍、锄草、割草和挤牛奶。本来每月工资35元，主人见我个子小，只给我25元。

农庄共有8匹马，主人要我分管4匹，每天清早把马鞍套上。这些马又高又大，马背几乎与我头顶齐高，我害怕被马蹄踢伤，不敢接受这种活。主人的儿子看出我的心事，对我说，每匹马都有自己的名字，你只要呼叫它的名字，就很驯服，不会有危险的。试之，果然灵验，这才接受下来。

吃过早饭，就下玉米地锄草。这种活我在国内曾经干过，没有难住我。但是驭马割草的活就不适应了。那是坐在割草机上，马拖着割草机把饲料草割下，准备给牛马过冬吃的。主人的儿子告诫我说，马有时会被绳子绊住而狂奔起来，这时要紧紧拽住马缰，要是制止不住，从机器上摔下来，那是不堪设想的！你试两天吧。果然，有一次，马脚被地里的一根绳子绊住，立即疯狂奔跑，我

拉不住马缰，急中生智，立刻从割草机上跳下来，才免遭一场横祸。这件往事，今天回忆起来，仍旧心有余悸。

弃学再打工

前面讲过，我留学的地方是个小城市，不易找到工作，何况雇主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瞧不起我这个“个子小、体力弱”的中国留学生。有位朋友告诉我，要打工必须离开这里。我把这句话记在心上。终于，我有机会到密耳根州的积彩市工作，我已记不起是如何去的。那是个汽车城，有名的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只记得一个美籍华人到车站接我，他带我到卫理公会去做礼拜，并介绍给其他中国人。但在工厂找来找去找不到工做，直至第三天，有一个招工人员对我感兴趣，答应每天4块美金，次日到做车身的车间上班。我做了5个月又失业了。原来，工厂有货就招募临时工，订货做完就辞退工人。

我想去福特公司做工，苦无门路，后来找到卫理公会一位会友，他指点说，最好有人替你介绍，先打个电话，否则很难收你。我采纳了他的主意，一星期后果然如愿以偿，报酬是每天6块美金。记得那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活，活虽不重，动作可得敏捷，做完一天下班，觉得非常辛苦。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才渐渐习惯起来。

我干了不到一年，福特公司大为出名，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福特公司订了合同，大意是公司为中国筑公路，中国则买福特公司的汽车。福特公司为此招收200名中国学生在工厂学习，以便将来派往中国推销福特汽车。但是，报名条件有限制，例如，只招收美籍华人，必须是大学生，等等。我第一条就不够格。又过了一年多，大概由于条件过苛，生源不足，经人撮合，我终于从临时工转为学生。那时该厂每天生产700辆汽车的引擎，原先

我当工人是三班倒，要轮流做夜班，自从改为“学生”后，虽然工资仍是6美元一天，工作却轻松得多，更重要的是不必做夜班，从此，我才有机会上夜大学。我在该城干了三年（1923—1926），其中以“学生”身份工作近两年，毕业后不知何故并未派我去中国。

抵制戴“绿帽”

初到美国时，第一学年算是大学新生。在南德库他州卫理大学，一年级新生要戴绿帽，“绿”表示“新”的意思，但是，戴绿帽的学生走路要规规矩矩，不得男女并排走，犯了校规处分也特别重。我和郑同学认为这是带有歧视性的规定，特别不符合中国的习俗，仍予以抵制，坚决不戴。后来学生自治会派人来做动员说服工作，我们以中国的风俗为由，据理力争，他们也说了许多“道理”，最后来个折衷，让我们戴一个星期做个样子。

学成回祖国

我从卫理大学转到福特商业学校，最后进密耳根大学。在第一次转学时，由于汇款接济不上，历尽艰辛，挨饿受冻，有时一天只吃一餐，晚上则在火车候车室或公园过夜。在福特商业学校毕业后得不到分配，又继续当工人，约两个月后才进密耳根大学。那是1926年9月的事。

密耳根大学规模颇大，我在前阶段打工积了一笔钱，就在校理学院专心就读。一年后转入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系，于1929年6月毕业。

毕业后在密耳根州公路厅担任初级工程师，主要负责公路桥梁设计。1931年9月回国。

1948年再度赴美深造，1950年回国。

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 给我一件终生难忘的启发

刘蕙孙

最近，我写了一篇《科技是财富，文化也是财富》的文章，原商业部胡平部长看了很感兴趣，嘱咐商业文化研究会派人来与我联系；上海《文汇报》“企业界”专栏还特地提供版面，分三期连载拙文；江苏省“城乡企业协会”、“城乡企业家协会”以及一些乡镇企业也都来信联系。说到我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思路，是远在60余年前，在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留学时，一个偶然的感受所触发的。我童年曾随父母、亲友住在日本京都，对日本民间情况较熟悉。后来在天津偶然考入天津同文书院。这个学校是中日合办的，不久，就改为“日本退还庚子赔款学校”。名为“中日学院”。中学毕业后，用庚子赔款送我到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留学。当时，中日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紧张，一个中国青年，小时又住过日本，正面、反面的感触必然是很多的。但有一件正面的感受，六十年来始终没有忘记。就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同学去参观学校办的商品陈列馆。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东洋货是靠不住的，其商品只是表面上好看，价钱便宜，但不耐用。特别是经过了“五·四”抵制日货后，此印象更深。但进了商品陈列馆以后，一件粗劣的商品也看不见，转来转去，所陈列的都是一些精美、坚固、耐用的东西。我问了同来参观的同学前辈为什么是这样，他答说：那种劣物是为迎合中国人贪便宜的心理，专门向中国倾销的。此处所陈列的商品，式样是针对世界其它各国的优良商品，作为商战竞争之用。我听了不禁愕然！又见到许多富有日本特色的商品，

品种很多，价钱并不便宜，看上去似乎都很耐用。问同学，他说：这是为宣扬日本传统文化，这种商品，不但日本人爱用，符合日本人的爱国心理，就是西方人，若对东方文化有兴趣的，市场销路肯定也很大。这种带有某一国家、地区色彩的文化商品的销售政策，几乎全世界皆然。我因而想起在日本火车上卖茶的，往往采用一个粗劣的土制的茶壶和茶杯。我曾问过车僮，为何用这么坏的茶具装茶水，他答说：这是日本远古的厚手陶器的模样，一壶、一杯、算一件，喝完可以把壶杯带走，以教育国人不要忘本。当时我就感到日本政府用心良苦。在商品陈列馆看到的情况也正与此符合，而且是兼从经济方面着想。我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的国家，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且欧美人对于中国的古文化也十分景仰。为什么不象人家这样将优秀的古文化与实用商品相结合，以教育国人，并在世界打开销路，反而处处崇尚外国商品形式，加深崇洋媚外思想呢？从这一天起，如何改变此局面的思想一直存在于我的心中。

回国后，因为自己曾是高商的学生，自然而然想到去银行工作，先在青岛金城银行搞营业，如核对收款、做传票等折子、对印件等事务性工作，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一个样，很不感兴趣。后来又投考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马衡先生的研究生。马先生是搞金石考古的，后来又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他的影响下，我进一步打开了古文化的眼界，使这些古文化实用化之心也就更加迫切了。结束了研究生的学习后，我辞去了银行工作，转入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在研究院工作比在银行工作兴趣多了，但仍不免为考古而考古，并不能古为今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北平沦陷，北平研究院被迫南迁，研究所主任顾颉刚先生去甘肃兰州，其他人也各奔前程。我先后到私立学校中国大学（即教会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